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Yongnian Zheng

政治与社会译丛

郑永年 著
郁建兴 何子英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既然国家重建涉及利益的再分配，那么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就会有参与这个过程的强烈动机。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向公众参与开放，因此社会团体必须找到替代的方式来影响国家重建过程。当失势的工人和农民求助于“行动”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时，知识分子则利用自己的武器即“知识”去实现目标。

本章集中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作用于国家重建过程——通过想象和表达国家重建的不同话语。尽管国家仍然对学术自由实施着控制，但还是有产生这些话语的空间。虽然每个人都同意改革是一个国家重建的过程，但大部分人并不确定它最终把中国引向何方。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这个空间，并且为大众提供了一些认识上的图谱。不用说，不同的知识分子团体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也广泛地批评政府并挑战其政策。在这个意义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国家的争论的兴起也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本章试图详细描述关于中国国家的争论中的最重要景象：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郑永年 著

郁建兴 何子英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by Yongnian Zheng first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4

© Yongnian Zheng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 郑永年著; 郁建兴, 何子英译.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3
(政治与社会译丛. 第2辑)
ISBN 978-7-213-04004-7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11-2006-104 号

I. 全… II. ①郑… ②郁… ③何… III. ①国际化—影响—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②国际化—影响—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4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0044号

书 名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作 者	郑永年 著
	郁建兴 何子英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 (0571) 85061682 85176516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6.5万
插 页	2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004-7
定 价	3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政治与社会译丛编辑委员会

第二辑主编 郑永年

编委会成员 朱光磊 张小劲 张 静 林尚立
郁建兴 周光辉 周晓虹 郑永年
黄 平 景跃进 刘亚伟

出版者言

出版本辑“政治与社会译丛”是基于我们对出版职责和中国现实的思考。出版者承担着推动知识的引介、传播以及思想和文化的创新之职能，自然地，面对生活，我们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造。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过去经历了什么，她正在面对什么，她将走向哪里，这是每一个关心、热爱中国的人都应思考的。事实上，这不仅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关注，也随着全球化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而吸引了世界各地学者的目光，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正呈日渐繁荣之势，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也涌现了许多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潜心研究并撰写出来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我们引进并出版这些著作，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崛起中的中国唯有进一步打开视界，才能更清晰地认识自身，并在和其他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中，重塑包括学术在内的自身文化的品格。

本辑译丛所选书目是经编委会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的。这些著作研究立场客观，议题重大，视角新颖，体现了众位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对中国问题的准确把握，相信读者会从中获益匪浅。当然，由于作者的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定势，局限与偏见难以避免，读者很可能与我们一样对某些观点难以认同；同时，中国社会变化急速而深刻，相关著作中涉及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问题以及作者由此得出的论断，也许已经或正在由改革所解决和修正。以上两点，读者诸君不可不察。

上述文字，算是出版者的不算多余的“多余的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春

译丛第二辑序

译丛第一辑序曾指出,译丛的总体目标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寻找和确立一个反思自身现代性的“他者”,在了解“他者”的过程中,认清和确立自身。那么,更进一步,通过认识他者眼中的“我”来认清自身,是不是一条更便捷的路径呢?在确定译丛第二辑书目之时,编委就这样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当代中国研究。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呈现日益繁荣的趋势。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繁荣。随着中国内部的发展和外部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有机分子。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已不能忽视中国因素,都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作为对外政策基础的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现状。了解中国的需求使得西方各国对中国研究进行大量的资助。从学术进步来说,中国的转型已经为海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实验室。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为他们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素材。欧洲的转型产生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包括马克思、韦伯和杜尔凯姆。中国的大转型可说是一个迥异于西方世界的绝好实验室,提炼自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很多理论框架和范畴都可在此接受检验,或被证伪,或得到拓展充实。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转型现象,那么其说服力就成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研究的学术兴趣已经越出中国问题专家这一群体,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在研究群体中,最值得指出的是,游学海外的具有中国背景的学者成长得很快,并且已经成为当代西方中国研究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的研究往往是他们在西方接受的社会科学训练和他们的中国经验的对话

结果。这种对话是海外学者本身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国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变化也同样重要。传统的汉学基本上把中国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汉学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基本上没有把中国研究整合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与传统汉学不同,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大都基于社会科学,在研究中国的同时努力把中国研究整合到一般社会科学中去。社会科学和中国研究的整合正把海外的中国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所有这些因素的驱使下,不断有优秀著作和论文问世。

返回到国内,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复杂性激增,诸种论争近年来愈渐尖锐,改革似乎到了“行路难,多歧路”的困难阶段。改革之初,我们或许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改革行进到今天,不对过去的历史和当下所面临的复杂现实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认识,那显然会迷失未来的方向。人的理性固然非常有限,而人类的发展也极少遵照人的理性前进。然而,反思过去,尽可能地理解历史,发现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中可能存在的某些模式或规律,使社会尽可能地朝着我们加以认同的方向走去,正是社会科学家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此种背景下,引进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优秀成果无疑是一件急需做的有价值的事情。任何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孤立进行,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既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社会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内部发展必然要关切外部世界的境况。西方中国研究往往采取比较的视角,就是把中国置于国际的环境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研究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取向具有参考价值。就学术进步来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是中国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真正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随着中国的崛起,各方面也在热议如何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但所谓的国际话语权就是说,中国的学术不能自说自话,如果海外不接受中国的话语,那么就很难在国际话语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就是说,中国的话语权必须是在和海外的互相交流和互相辩驳中发生和发展的。而引进海外的中国研究作品当是最有效率的一个途径。

我们也相信,本土研究和域外学术是长短互见的。国内学者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有着无可匹敌的现场面对研究对象的优势和资料获取上的便利,能切身感受变化的细节和活生生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亲历者的地位也可能导致研究者被自身情感所左右,为利益所羁绊,为其所处时代的“迷雾”所蒙蔽,以至于不能跳出一时一地的障碍,发现问题并理性地把握事物的客观性。反过来,域外学者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容易持比较中立、客观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对象;

更重要的是,受西方深厚的学术传统的熏陶,他们崇尚科学的认知模式,重视经验、崇尚分析、善于系统化,其分析方式、审视的角度和力度往往是国内学者所缺失的。但同样,由于文化和历史的隔膜,他们也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的经验和境遇;他们在分析时所持的预设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适用于特定的中国社会。不过从学术进步的视角来说,学术范式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动力源自于不同范式间的交流和冲突。本土学术范式的进步需要海外学术范式,正如海外学术范式的进步也离不开本土范式一样。

所以,我们一方面期待在此译介的著作能开阔国内读者的视界,增加读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希望我们的读者能随时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些著作,在审视和追问中超越西方理论框架,真正逼近中国的经验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催生和提升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建立真正有活力的中国现代学术乃至社会科学。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谓任重道远,需要学术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郑永年
2008 年冬
新加坡国立大学

译者序

2002年11月,我在景色宜人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第一次见到郑永年教授。当时,他告诉我,他正在做一项关于中国国家重建问题的研究。由于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召开之际,我们的话题更多的是围绕领导人和政策的延续与变动。2004年,我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剑桥大学书店里看到了刚刚出版的《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我的记忆一下子被拨动了。我当即买下了这本书,试图借此连接起2002年的会见,认真领会郑永年教授的真知灼见。

多年来,我较为关注西方福利国家及其转型。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关注是我研究黑格尔、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延伸。在英国期间,我专程拜访了慕名已久的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教授。在兰卡斯特小镇(杰索普教授任教于兰卡斯特大学)等火车的时间里,我在书店买到了曾经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名噪一时的弗朗西斯·福山的新著《国家建构》(Francis Fukuyama, *State Building*,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该书中文版于2005年由中国台北时报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强国论》,中国大陆版则于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国家构建》)。

之所以把郑永年教授的书与福山的书放在一起回忆,是因为这两本书较大地影响了我对中国国家建构论题的关注。此前,我承担过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资助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研究课题,也在这些课题研究中保持着强烈的中国关怀,但这些关怀常常只是隐含其中,并没有得到直接表达;更由于东西方之间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我考虑较多的是西方福利国家治理、社会政策等的中国适用性。2004年出版的这两本书给了我很大

的启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无疑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连,但它是一个独特的重要研究领域。相应地,由于现有的政治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等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运用这些范畴、方法、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问题,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结合中国本土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范畴、方法、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验观察中有用的工具,并指出使用这些概念工具的限度,当是研究中国国家建构问题的重要内容。

因为9·11事件的发生,福山在新书中不再宣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为历史的终点,而重新认识了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性。相比较而言,《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直接考察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建构进程。福山在《国家建构》中开篇就指出,在当今世界的某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孱弱、无能乃至无政府状态,已成为导致包括贫穷、艾滋病、人口贩卖和恐怖主义等世界最严重问题的根源。冷战结束后,遍布世界各地的长期孱弱、积弊难返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无法发展自身经济,无法保障自身国家的安全,甚至还成为恐怖分子藏身之所,进而威胁国际秩序。冷战后的重大人道主义灾难以及其他国际危机,从索马里、海地、科索沃、刚果、东帝汶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几乎都是国家治理失败的记录。郑永年教授则小心地把中国与上述发展中国家区分出来。他说:“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两个层面上都对自身进行了调整,表现出非凡的灵活性。这与那种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僵硬的传统看法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在详细考察了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影响之后,他展开了一系列极其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如何兼容的?中国领导人如何付出巨大努力去确立一种与变动的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的新政治秩序?中国如何重构官僚体制?中国如何通过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改革,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国家?中国领导人如何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考虑来自社会的声音,不同社会力量又如何以不同方式参与国家建构过程?全球化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怎样的挑战?等等。这部著作成书于党的十六大之后,如今已是十七大在即。这些问题仍然还是当代中国鲜活的真实问题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当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正在路上。关于当代中国的全球化话语,只有包括了这些问题的讨论,才是完整的。

阅读这部著作,我深切感受到郑永年教授将拳拳的赤子之心融于严谨的学术研究之中。在以往的讨论中,很多学者都曾经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受到

了全球化的极大影响,但是很少有人说明这些影响是什么,会以何种方式出现。这部著作对这些影响进行了细致分析。在以往的讨论中,很多学者将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线性关系,即将全球化作为影响中国变革的一个常量。这部著作把两者处理为一种表征关系,即不只是全球化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中国的政治秩序变迁本身也属于全球化过程。我以为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全球化思维方式。此外,书中提出的诸多判断,如关于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契合点,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关于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与建设现代化经济国家的关系,关于党的自身变革与法治的国家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等等,都令人耳目一新。即使是对着墨较少的公民社会发展与国家建构的关系,书中也有不少精辟论述。比如,书中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保守主义取向做出了判断,指出争辩中的新左派(与保守主义某种程度上重合)与新自由主义(80年代自由主义的复活)的“政治意义在于,两者分别获得了来自社会、经济的不同力量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由派代表了新兴富裕阶级的利益,而新左派则代表了工人、农民的利益。但事实上,新自由派和新左派都不愿把自己与任何社会力量完全结合。然而,急剧的社会经济变革迅速推动着知识分子把自己与相应的社会力量结合起来。”联想到今年夏天因《读书》杂志更换主编而引发的广泛争论,书中的很多论述在今天仍然具有解释的有效性。

出于对这部著作及其论题的激赏,我在把它推荐给朋友、学生阅读之余,萌生了翻译它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了浙江人民出版社王利波编辑的大力支持,她将它列入正在精心打造的“政治与社会”译丛。我邀请了博士研究生何子英同学与我合作。子英君高度认同这一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不辞辛苦,常常提前完成他所承担的分工任务。而我由于杂事繁多,进展较慢。今年夏天,我客居美国凤凰城。凤凰城酷热无比,我每天蜗居于斗室之中,全心全意,终于把全书译校完毕。基于不同语言、文化等表达上的差异,我对原著中的一些段落、词句作了改动,书中的一些观点、判断,亦有可商之处,相信读者诸君能够予以辨识。

在完成译事之际,我要感谢王利波编辑对这一选题的慨然接纳,以及对我推迟交稿所表现的宽容。我要特别感谢原书作者郑永年教授,他在百忙之中多次回答了我们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今年5月,他应我的邀请出席了在浙江大学举行的“地方政府创新与公民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并且发表了主题

演讲。不仅如此,他还在浙江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全校公开演讲,展示了政治学家的风采,受到了热烈欢迎。事实上,他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精彩专栏文章已经让许多中国读者认识了他。我希望这个译本的出版,既能让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郑永年教授,同时也能促成一种机缘,一种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缘。

郁建兴

2007年8月28日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英文版序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化席卷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尽管许多国家从资本、人才、科技知识和其他资源——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现代化事业所需的资源——空前的全球流动中获益,但全球化也带来了大量不可预知的后果。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非常乐观,认为全球化预示了全球民主运动的肇端,它将给全球共同体带来更美好的前景和更大的繁荣。然而,1997年的金融危机和政治动荡,引发了人们对这种乐观信念的修正。由资本急剧而大量的流动所引发的后果笼罩着全世界,同时全世界还面临着另一种灾祸——全球恐怖主义。在美国发生的9·11袭击事件是恐怖主义活动在世界其他地方,如在东南亚开始肆虐的预兆。就本质而言,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就像物理学揭示的那样,全球化过程中的每一个行动或新发展都有着它自身的反作用或后果。

本书试图考察在亚洲背景下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影响。许多年来,亚洲国家成为学术探讨的焦点。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促使我反思全球化及其对亚洲社会中的民族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度尼西亚在向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动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恐怖主义在许多亚洲国家的扩散。我相信,如果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球化时代被整合成世界共同体的一部分,那么民族国家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从全球化中获得最好的结果,同时又使其消极后果最小化。民族国家该怎样去实现这个目标?亚洲各国以不同方式回应了全球化。本书讨论的是全球化与中国的问题。

除了共产主义遗产,中国在应对全球化时并没有与其他民族国家有特别的不同。世界已经见证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并且反全球化成为这种新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担心全球化将削弱民族国家

政府管理国内事务的权力,并且担心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上失去其作为独特民族国家的身份。事实上,在中国之外,许多学者和评论员都质疑中国能否在全球化中生存。一些人认为,中国正在经受严重的治理危机,另一些人甚至预警它已经接近崩溃。

我们需要对全球化的影响做更具体的考察。当学者们关注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成本和收益时,很少有人把注意力放在全球化带来的政治影响上。虽然许多学者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的政治制度将极大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但是他们并不打算详细说明这些影响是什么,会以何种方式出现。本书试图考察中国是如何调整自身以应对全球化的。

在其他方面,全球化同样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然而,中国的领导者把全球化视为重建中国国家的独特机遇。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人竭尽全力地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国领导人是怎样积极地把国家推向全球化的呢?我发现在中国领导人中盛行着一种独特的心态。民族主义指向建立一个强大而富裕的中国,同时,中国的领导人也承认这样一种目标只能通过把国家整合进全球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在后毛泽东时代,这种心态深深根植于中国的领导人当中。尽管上层领导人之间常常发生痛苦的政治斗争,但是全球化过程却从来没有延缓下来。对全球化深刻的意识形态认同,使领导人竭力把资本主义合法化为一种建设一个繁荣而强大国家的手段。领导人也重建了官僚体制、经济制度和其他主要的国家制度。制度重建已经使中国能够应对全球化。当人们过早地认为中国将在全球共同体的巨大整合中变得越来越强大时,我们必须理性地回答,中国在全球化中获益匪浅的同时,又是如何减轻其负面作用的。

通过具体考察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本书试图实现三个主要目标:评估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严重程度;考察中国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指出全球化的未来挑战。首先,我发现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产生的更多的是机遇而非危机。全球化当然给中国制造了许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中的很大部分是过渡性的。在应对这些问题时,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建自身的机遇。那种认为全球化将导致中国崩溃的观点,并没有让人信服的根据。我的第二个发现是,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两个层面上都对自身进行了调整,表现出非凡的灵活性。这与那种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僵硬的传统看法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共产主义制度可以改革,可以通过为适应全球化进行的不断调整而实现自身的转型。第三,我发现全球化的真正挑战,是对中国共产党,

而不是中国的国家而言的。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需要法治基础的国家治理。全球化促使中国不断地使自身理性和制度化,并且在许多方面,国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也付出了极大努力试图容纳全球化,如变革其意识形态标准以及吸收企业主入党,但是党如何让自己遵从法治,以实现国家的全面制度化,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受益于许多人。首先要感谢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的同事们。王赓武所长不断为我提供强大的知识和精神支持。他对历史的深刻洞见使我能够超越对全球化的纯粹经济计算,而辨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长期影响。黄朝翰教授是研究主任兼经济学家,我分享了他关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制度影响的观点。其他许多同事也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支持着我。当我发表关于这个方案的最初计划和思想时,他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特别感谢刘志强、何包钢、蓝平儿、邹克渊、赖洪义和郎友兴。

多年来,东亚所邀请了许多海外学者来访问或参加会议。这些学者频繁的访问为本所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联系,而我从这些交流中获益匪浅。我也因此能够就这个研究项目和世界不同地方的学者们讨论许多问题。在他们之中,我要感谢 Peter Katzenstein、Andrew Walder、Lynn White、Gilbert Rozman、Kjeld Eric Brodsgaard、吴国光、裴敏欣、孔庆江、Ignatius Wibowo、王红缨、赵建明、陈维星、萧功秦、郑世平和钟扬。在过去的两年中,我还受益于几次讨论国家建构的专题研讨会,并且要感谢王绍光、朱云汉、胡鞍钢、周建明、崔之元、史天健、汪晖、王希和曹锦清。Lye Liang Fook、Sarah Chan 和 Wong Chee Kong 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帮助。东亚所图书馆的许多图书管理员为我提供了研究所需的资料信息。

我也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 Marigold Acland、Amanda Pinches 以及 Carla Taines,他们为我提供了有效的编辑支持和指导。我要特别感谢 Acland 为书稿最初的评论到最后的出版所做的工作。

第七章的早期版本曾经以郑永年“中国的国家重建、大众抗议和集体行动”(“State Rebuilding, Popular Protest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为名,发表于《日本政治科学杂志》(*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2年第3期。此处重印已得到授权。

目 录

图表目录	5
译者序	1
英文版序	5

第一章 全球化：国家衰弱还是国家重建？

中国的全球化	2
信息社会的兴起	7
中国国家的弱化	11
全球化与国家	14
本书论题	19
本书结构	20

第二章 国家、领导集体与全球化

学术背景：国家与全球化	23
全球化与国家的重塑	26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33

第三章 全球主义、民族主义和有选择的输入

作为一种心态的全球主义	42
作为有选择的输入的全球主义	44
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历史遗产	44
改革、合法性与有选择的输入	55
民族主义、有选择的输入与创新	60

第四章 权力、利益与资本主义的正当性: 建构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秩序

对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热望	65
经济发展与政治利益	68
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兴起	71
政治秩序受到怎样的影响	75
对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秩序的反对	79
建构一个新的政治秩序	83
结论	86